

CHINA&US FOCUS DIGEST



中美聚焦

文摘

2020年10月号 总第13期

拒绝脱钩



ISSN 2414-0783



9 772414 078005

出版 中美交流基金会

主 席 董建华
发 行人 黄德荫
主 编 张 平 常 虹
顾 问 朱英璜
编 辑 彭 慧

《中美聚焦文摘》是一份双月刊杂志，刊登中美两国具影响力的领袖和学者有关两国相关议题的评论文章。

您的意见和建议，请电邮至
digest@cusef.org.hk

公司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3 号亿利商业大厦 20 楼
电 话 (852) 2523 2083
传 真 (852) 2523 6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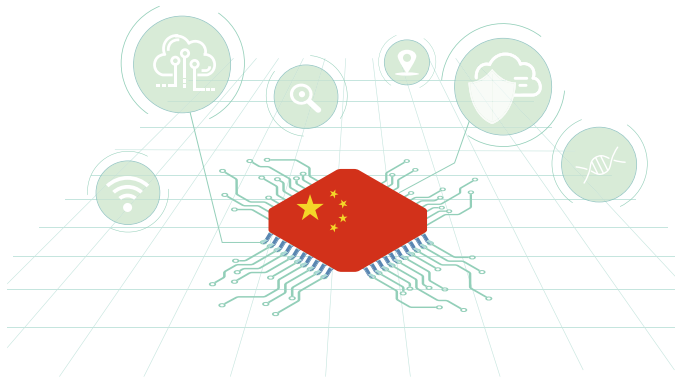


cn.chinausfocus.com
关注 Facebook 和 Twitter: @ChinaUSFocus

特别鸣谢

Chatham Strategies 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鼎力支持

封面故事



中国以开放和创新应对美国“脱钩” P. 06

陶文钊

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有效的应对办法就是继续开放和创新。美国的打压政策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它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也会激励中国。



“双循环”战略 P. 10

刘遵义 (Lawrence J. Lau)

当今中国的最大风险是经济上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并尽其所能做出贡献。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自给自足也许只会降低它的生活水平。

中美学者太平洋对话

中美学者太平洋对话：军队需要危机管理 P. 15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中国 P. 21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随着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两位候选人如何处理对华问题仍然是确保当选的关键。



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将犯下历史性错误

P. 25

赵启正

美国正在制造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强硬派对中国的崛起太过敏感，全面遏制中国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沟通的力量

P. 28

安刚

坚持沟通的目的是在复杂性和流动性极强的时期尽量澄清一些事实、消除一些误解、避免一些误判、杜绝一些误传，为将来中美关系可能的良性调整预留空间。

中美应如何避免爆发新冷战

P. 33

张沱生

只有坚持对话才能管控潜在的冲突。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即使是有限冲突，也将从此打开中美长期冷战的大门。

作茧自缚的政策

P. 37

李成 (Cheng Li)

麦瑞安 (Ryan McElveen)

由于中国的所作所为让华盛顿感到担忧，也促使美国政府调整政策，两国精心编织的文化教育交流网正面临破裂危险。但代价将远远大过收益。

美台军事同盟是否重生？

P. 42

特德·盖伦·卡彭特 (Ted Galen Carpenter)

华盛顿正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即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再模糊或犹豫不决。

美国正走出对台政策“模糊”

P. 45

严语

缺席的美国

P. 48

张云

中国经济向内大转变

P. 50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Christopher A. McNally)

给紧张的中美关系降温

P. 56

何伟文

RIVERS OF IRON

P. 59

“脱钩”无益于任何人

张 平

随着美国步入高风险选举季，关于中美脱钩的讨论也达到了新高度。中国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本期我们推出了由中美知名学者围绕“脱钩”议题撰写的一系列评论性文章。我们希望帮助读者获取 360 度全景视角，从脱钩对中美两国（以及世界）意味着什么，到如果美国持续减少文化教育交流会怎样影响中美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由美国发起的脱钩战略已开始日益滑向危险的境地。台湾海峡军事活动的危险升级挑战着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的基石，使中美两国有可能爆发战争甚至断绝外交关系的猜测甚嚣尘上。

是时候对“脱钩”说不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是几百年来让中国和世界受益匪浅的深厚智慧。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走上冲突歧路。

本期我们还刊登了最新一期“太平洋对话”——“军队需要危机管理”，它包括对中美两位退役军方人士的专访。

其他文章包括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现状报告以及针对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深入观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来读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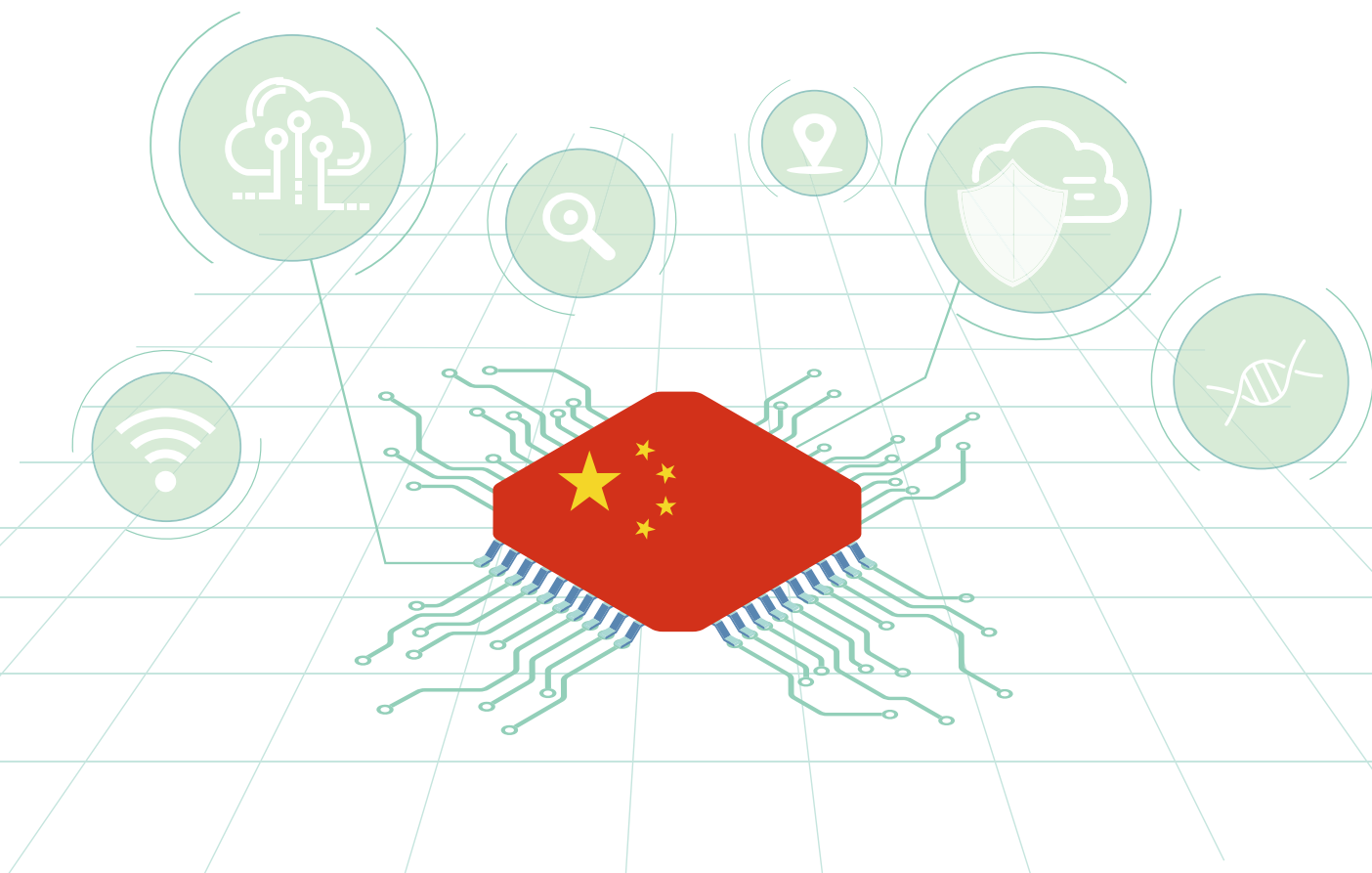
An exciting journey to
see and **hear** China
first-hand.



thechinacurrent.com [@thechinacurrent](https://twitter.com/thechinacurrent) [#thechinacurrent](https://www.instagram.com/thechinacurrent)

中国以开放和创新应对美国“脱钩”

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有效的应对办法就是继续开放和创新。美国的打压政策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它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也会激励中国。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于中美脱钩问题已经讨论了一两年，两国学者和国际社会也发表种种议论。美方没有对此下正式定义，但从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其团队的多次表态以及这两年的实践看，他们鼓吹的“脱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断绝两国间在各方面的一切交往，把两国关系降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水平，降到尼克松 1972 年对中国“破冰之旅”之前那样。特朗普就说过，美国确实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选项”。另一种是指美国的战略取向，即美国尽其所能限制、约束、减少与中国的交往，以各种方式打压中国。

第一种情况是不现实的。中美建交 40 年来，两国关系不仅是政府间关系，而且成为两个社会间的关系，各种联系和纽带千丝万缕，不是哪个政府一道命令就可以轻易切断的。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十年有望继续贡献全球 1/3 的经济增长，中国 14 亿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对企业家无疑十分有吸引力。脱钩说到底还是市场行为，而市场主体是企业，是否脱钩要由企业说了算。上海美国商会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仍将中国消费市

“

对美国的盟国和伙伴来说，中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对华经贸关系与各国经济增长休戚相关。

场视为巨大的机会。尽管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紧张，但超过 92% 的美企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超过 2/3 的公司表示将保持或增加在华员工数量，只有 4.3% 的企业有将投资迁回美国的打算，而且是一些比较小的企业。

在过去数十年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努力发展平衡的贸易，与东盟、欧盟的贸易都持续迅速增长。美国鼓吹脱钩将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深深忧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外交》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一些欧洲官员的言论都表明，如果美国硬要对华脱钩，它们不会一味追随。对美国的盟国和伙伴来说，中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对华经贸关系与各国经济增长休戚相关。它们对中国崛起的感受与美国不同，美国所焦虑的是中国对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挑战，而它们没有这种焦虑感。当然，一些企业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进进出出，调整产业布局，这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行为，与脱钩无关。

“

特朗普就说过，美国确实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选项”。

“

中美竞争，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军事领域，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所以美国不能听凭中国赶超，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集中在科技方面。

第二种情况这些年则已经在发生。美方对中国的打压既是全面的，又是有重点的，这个重点就是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多年来，美国雄踞全球科学技术制高点，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和最多的知识产权。美国在技术创新上领跑全球，上世纪90年代其IT产业就引领世界潮流。现在美国整体上仍居全球之冠，但在有些领域，主要是5G和人工智能，中国或已领先，或有赶超势头。中美竞争，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军事领域，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所以美国不能听凭中国赶超，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集中在科技方面。现在芯片技术是核心的核心，特朗普政府颁布了

多道行政命令，既不许美国的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使用华为技术和产品，也不许美国企业与华为做生意和向华为供应芯片，甚至不许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企业与华为有业务关系，否则就要长臂管辖，实施制裁。特朗普政府高官还亲力亲为，威胁与利诱并用，跑到欧洲不遗余力地游说盟友和伙伴与华为断绝关系。如此围剿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但对华为的打压也是“斩敌一千自损八百”，华为是美国软件供应商的大客户，仅2019年华为购买美企生产的零部件就价值187亿美元，切断与华为的关系将使美国企业减少出售软硬件和APP



▲ 2020年6月1日，中国发布了海南省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总体规划，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被称为“东方夏威夷”的海南自由贸易区现在成为了博彩、科技和奢侈品的旅游胜地。

的机会，危及美国数万就业岗位。波士顿咨询集团最近的研究表明，从长远看，一场全面的美中脱钩将使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营收萎缩 37%，大大减少其全球市场份额。这莫非就是特朗普政府准备为打压华为付出的代价？

对于美国的技术打压中国是必须应对的。中国的办法主要是开放和创新。

中国用“改革开放”来定义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个时期，可见中国把“开放”看得何等重要。近年，虽然美方发动了对华贸易战，又有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的国际环境受到负面影响，但坚持开放这一点丝毫没有动摇。中国进一步修改压缩了负面清单；中央政府支持海南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北京举办了疫情以来全球第一个线下服务贸易博览会，并将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这些措施都表明，中国的大门正越开越大。这无疑将增强对国际经贸伙伴的吸引力，是对美国脱钩战略的有效对冲。中国的措施产生了良好效果，今年 1 至 8 月，虽有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实际使用外资仍达 6197.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6%。8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84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7%。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度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高质量”的主要内涵就是掌握更多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像中国这样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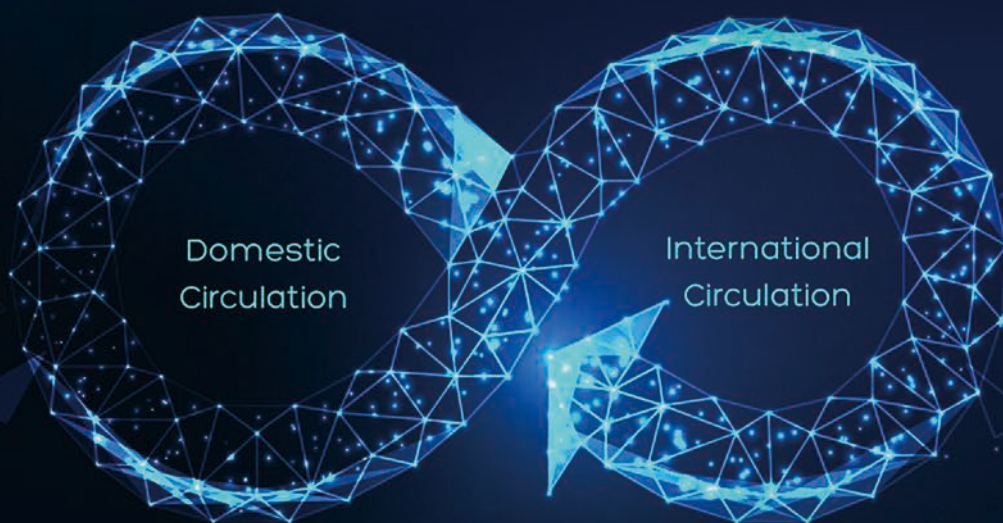
美国的打压政策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也会带来激励。

发展中大国，要长期依靠大量引进国外技术来支撑经济增长也是难以实现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一字之差，关键就在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制造业的根，制造业可以一时枝繁叶茂，但如果没有根，暴风骤雨袭来后就可能被刮倒。这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即便没有美国的打压，中国也是要努力去掌握核心技术的，这些年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高铁，中国就掌握了许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现在看来，美国对中国技术打压的政策不会轻易改变，两国的技术竞争将是长期的。芯片已成为中国自主技术体系中最突出的短板，是中国应对美国科技战必须突破的首要领域。美国的打压政策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也会带来激励，国家和企业会加大投入，全社会将进一步树立尊重知识和人才的风气，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会更加完善。而通过脱钩来阻遏中国继续发展，只会让美国作茧自缚。

“

从长远看，一场全面的美中脱钩将使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营收萎缩 37%，大大减少其全球市场份额。

“双循环” 战略





刘遵义 (Lawrence J. Lau)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当今中国的最大风险是经济上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并尽其所能做出贡献。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自给自足也许只会降低它的生活水平。

8月24日，在一个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国家的发展路线规划：“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1950年直到1978年启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这期间中国经济基本上只有一种“单一循环”，即国内循环。上世纪50年代中国还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有限的易货贸易。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朝鲜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贸易禁运，部分是由于从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国出现争端。

随着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第二种循环，即国际循环，再度起步，这可以看成是双循环的恢复。不过，这一早期阶段的重点仍然是国内循环，而且两种循环被有意分隔开来，目的是让中央的经济计划能像以前一样延续下去。

也就是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这两种循环是完全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在一种循环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不能被用来供应给另一种循环，反之亦然。在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双循环可以说是互无交集的两个圆，一个代表国内循环，一个代表国际循环，彼此几乎没有

“

在经济上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双循环可以说是互无交集的两个圆，一个代表国内循环，一个代表国际循环，彼此几乎没有接触，没有重叠，而且国内循环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

“

尽管从原则上说，某种程度的完全孤立和完全自给自足是可行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绝对是不可取的。

接触，没有重叠，而且国内循环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这两种循环开始产生交集。外国直接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境内购买它们的投入，销售它们的产出。同样，国内生产者也可以使用进口投入，并将产出卖给国内或国外市场上的任何人（最开始的前提条件是要先履行中央计划规定的义务）。

2000 年中国加入 WTO，国际循环进一步扩大，一直到 2010 年左右，国际循环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后，由于人民币升值、中国国内工资上涨以及中国商品在出口市场逐渐饱和，国内市场才开始重获优势。工资上涨提高了中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带来了对进口消费品和含有进口零部件产品的巨大需求。

孤立和自给自足

尽管从原则上说，某种程度的完全孤立和完全自给自足是可行的，正如中国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证明的那样（朝鲜今天似乎还在实践），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绝对是不可取的。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它的贸易伙伴国也是。然而，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各国内部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自由市场只会奖励赢家，却不善于处理输家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给每个国家都创造了足够的收益，原则上讲每个人都可以过得更好。而补偿输家是各国政府的责任。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为失败者提供足够的补偿，中国则通过其社会保障网和减贫脱贫项目，确保了每个人都是赢家，尽管程度各异。

中国今天有可能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只是它的实际生活水平会显著下降。过去 40 年里，中国制成品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部分原因是与进口制成品展开竞争，以及“边干边学”。

但是，仍然有一些产品是中国目前无法制造的，比如大型飞机和先进的半导体。一些大宗商品中国目前也无法足量生产，以满足国内的需求，比如粮食、石油、铜和铁。这些商品和大宗产品现在还需要大量进口。如果中国完全放弃国际循环，那

“

与美国经济脱钩并不也不应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上脱钩。

就意味着这些商品和大宗产品要么没有，要么数量有限。

回归单一的国内循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需要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应该与自给自足划等号。与美国经济脱钩并不也不应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上脱钩。中国不能靠退却来取胜。为了维持国际循环，中国需要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支持，特别是欧元区国家的支持。

考虑到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潜力，双循环实现可持续——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际相互促进——是非常有可能的，但中国需要解决外国对关键产品和技术出口设限的问题，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当下的重点，是促进作为中国总需求组成部分的家庭消费。这需要提高劳动力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低工资是中国非农劳动力全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并由中央决定其工资水平的时代遗留下来的。现在的挑战是如何放宽工资政策，而又不导致工资暴涨。工资大幅上涨有可能导致商品价格大涨。

当然，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能完全依靠私人家庭消费的增加，还必须增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消费，包括环境的养护、保护和恢复，创造或维持蓝天和绿水青山，提供人们负担得起的教育、医疗和老年护理，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

政府还必须承担扶持自主创新能力的责任，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以便使双循环在长期内可持续。

需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只要经济是开放的，赢家和输家就会不断产生。但自由市场体系本身并不能补偿输家，因此政府有责任对赢家的所得征税，并利用这笔收益帮助支持失败者。除非失败者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会抵制经济全球化，支持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

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过去 40 年里，中国有 8 亿多人脱贫，到今年年底，中国应该没有一个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了。因此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它没有失败者。与 1978 年时的境况相比，现在每个人都是而且已经是赢家了。减少和消灭贫困不仅使收入分配均衡，而且增加了总的家庭消费需求，因为低收入家庭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尽其所能做出贡献，并维护国际秩序。可以考虑与志同道合国家相互实施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的“三零”战略，当然，幼稚产业不包括在内。

“

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
世界其他地区隔绝。

The Pacific Dialogue



The Pacific Dialogue is a new way to virtually connect thought leaders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o continue frank and direct conversation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军队需要危机管理



姚云竹

“

最好是美国停止侦察活动，或至少缩小侦察活动的规模，停止利用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进行挑衅。

“

我和中国人交谈的经验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几乎任何问题。



比尔·欧文斯 (Bill Owens)

“太平洋对话”是通过电话会议连接太平洋两岸的思想领袖，在这个艰难时刻继续进行坦率的对话。

“太平洋对话”第四部分的嘉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姚云竹和美国退役上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比尔·欧文斯。

对话于2020年8月8日进行，由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在香港主持。以下是对话节选。

周柳建成：

我们先从南海说起吧。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另一个引爆点。这个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军舰的进入会带来更多问题吗？姚将军，请您先开始吧。

姚云竹少将：

在我们谈南海的时候，涉及到两种问题。一种是南海沿岸国家之间的，它们存在争议是因为领土和海洋权益有重叠，这些争端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另一种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其中一个是双方接触，即空中和海上的情报刺探活动，还有一个是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它是美国海军多年来故意侵入中国领海的行为。用美国海军的术语来说，就是要挑战过度的海洋权利主张。我想，中国对情报收集、侦察和监视活动是不满的，这种侵入中国领海的行为不可能让人满意。因此，解放军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这就是为什么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关系紧张的原因。特别过去几年里，这些活动的数量、节奏和强度都在增加。所以说，当前的情况确实很危急。我想，过去也发生过一些危机，比如撞机事件，以及一些非常近、非常危险的船只相遇。我想将来还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事情。

周柳建成：

欧文斯将军，您对此有什么回应？会发生更多像过去那样的事情吗？

比尔·欧文斯上将：

嗯，我理解姚将军的意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写这些事情的人，尤其在美国，都没有真正了解历史，了解二战以后这些地区到底发生过什么。了解历史很重要，要了解——就像她说的，在许多年里，几十年吧——同样的权利却遭到反对，两个国家对同一块地方都声称拥有主权，中国没有采取过任何侵略行动，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比如有在公共区域钻

“

我想海军和空军自己就可以通过适当的外交手段，找到做这些事情的办法。

井的，或者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自己在一些小岛上加强了驻防。我们已经忘了南沙群岛和南海其他岛屿的历史。我想在某些方面，我们——也许是美国和中国双方——有意激化了这方面的讨论。我恰恰认为我们有办法解决航行自由和侦察飞行问题。我想海军和空军自己就可以通过适当的外交手段，找到做这些事情的办法。

炒作南海问题，在我看来既无助于中国人民，也无助于美国人民。我希望它不是政治性的。可能两边都有问题，但我认为有解决的办法。冷战期间，美国 and 苏联找到了办法，在冷战结束后通过外交手段，和海军、空军一起解决北极问题，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我期盼我们能一起努力了解历史，了解中国所经历的，以及其他国家所经历的，从而理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含义。美国没有签署这个协议，中国签署了。

作为一个老人，看到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在南海出现大麻烦，我内心是痛苦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贸易自由往来还没有受到干扰。我想，多年以来，大概有 5 万亿美元贸易是经过南海进行的。所以航行自由，穿行的自由，看来还没有受到干扰。美国认为，

航行自由是维护船只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必须要了解，是否有船只在经过这些海峡时遇到了麻烦，恐怕这样的例子挺多的。

我还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世界上还有许多比南海更复杂的地区，比如地中海，那里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边界主张和反诉，而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我想，如果我们真的去尝试，用出色的外交手段，加上军事合作，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我祈求我们能真正试着去做。

周柳建成：

姚将军，您怎么看这种朝前走的方式，怎么看这种解决方案？

姚云竹少将：

我特别同意欧文斯上将解决南海问题的想法。我认为，或许我们都得实际一点，当然，最好是美国停止侦察活动，或至少缩小侦察活动的规模，停止利用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进行挑衅。不过现实地说，我不认为美国会这样做。为此，为实际起见，我想两国、两军一直都在努力建立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建立控制事态升级的体系。

2014 年，两军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一份是关于重大军事行动通知，另一份是关于海上相遇行为准则。这是一种努力，用来规范前线水兵和飞行员的战术行为，以便他们就能以一种多少可预见的方式互动，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彼此之间的交流，减少误解和错觉的发生。最近，就在一两个星期前，两国国防部长互相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

“

最好是美国停止侦察活动，或至少缩小侦察活动的规模，停止利用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进行挑衅。

“

我和中国人交谈的经验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几乎任何问题。

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和改进危机管理，以及更好地利用现有机制。也许还可以建立一些新的东西。这是近年来两军之间最重要的事情。

周柳建成：

欧文斯将军，几个月前我在北京的《三亚倡议》会上和您交谈过。您谈及，人民对您来说不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情感问题，特别是在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当中，有这么多经验可以借鉴。

比尔·欧文斯上将：

是的，由于两国的政策，只能尽力而为。我认为两国都是如此。不是“中国人在占我们美国人的便宜”，也不是“美国在占（中国的）便宜”。我们需要作为人来参与，就像姚将军和我一样，来讨论这些事情，对一些事情笑笑，但在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时，要非常认真。我敢肯定是有解决办法的。当然，美国并不完美，我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我猜中国肯定也是不完美的。但我们都是伟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姚将军，没有哪个国家比你们让人民过得更好了，而美国则坚守着许多对世界来说真正重要的原则。我和中国人交谈的经

验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几乎任何问题。

周柳建成：

姚将军，您怎么看呢？

姚云竹少将：

你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看待美军，或者我本人如何看，我认为，这种看法会随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对美军的看法是，它是一个共同对抗前苏联的防御伙伴。当时，我们合作得非常好。虽然和美军相比，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弱，很落后，但我们有很多合作往来。从90年代开始，人们的认识变得复杂起来。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级，而美国在政治上大肆炒作中国军队窃取军事机密，刺探美国情报，似乎和今天有些像。美国国会通过法律，限制两军交流。我想解放军即使仍然想向美军学习，想和美国军队合作，（现在）也不能了。

必须意识到，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很可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打一仗。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且得做好准备。但在此之前，我忘了说，在90年代早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非常钦佩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取

得的辉煌而彻底的胜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学习这场战争。欧文斯上将，您就是其中一个学习研究的对象。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把您的演讲和文章翻译成中文，因为您被认为是军事革命的三位先驱者之一，其他两位是安德鲁·马歇尔和威廉·佩里（国防）部长。我想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把美军当成老师来仰望的，我们非常想向你们学习。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变了，为此，中国军队不得不做与美军进行军事对抗的准备，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但我依然认为，发生军事对抗或军事冲突并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所以，实际上我们仍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避免无意之中卷入战争。

比尔·欧文斯上将：

姚将军，我想，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希望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我的意思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一支高质量的军队，特别是中国人民经历过日本入侵，经历过挑战，需要有对中国船只开放的海

“

必须意识到，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很可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打一仗。

洋。我不会质疑中国有责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军队，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我认为，至少在许多年内，美国也需要有高质量的军队。当然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两国都越来越厉害，我们的军队都越来越强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不危及自己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找到合作的办法。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是我在这本书里提到过的，那就是，这是新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我认为，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正在发生。美国可以清晰地看到大片领土，每艘船，每辆坦克，每架飞机，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我们有武器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去对付那些目标。我认为中国人具备这种能力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现在有两个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哪个指挥者先扣动扳机。它意味着谁先扣动扳机，谁就可能赢得胜利。我们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了。

几年前，在许多人还没弄明白网络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建议美国和中国签订一个“不首先使用”网络攻击的条约。我现在还是这么主张。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信任很重要，我相信姚将军会同意这一点。如果我们相互信任，我们就去建立强大的军队好了。正如姚将军所说，我多年来一直着迷于军事革命，它证明，高明的智联式军队和强大的武器是一切的关键。这与我们两国拥有多少军舰、坦克和飞机无关，那并不重要。但在美国和中国，我们对能够利用现代技术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非常小心谨慎。我们需要领导世界去寻找合作的途径。

周柳建成：

姚将军，我们刚刚过了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 75 周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我只是想了解您作为核政策问题专家的一些看法。您认为世界有没有可能消除核武器呢？

姚云竹少将：

对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我的信念是，世界必须消除核武器。无论现在是否可能，我认为在未来这应该是人类的一个目标，因为核武器就算有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它是用来大规模杀人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只被使用过两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一瞬间就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所以，军事超级大国拥有这么多这类武器是个错误。我认为，只想着核武器会永远伴随着我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绝对是错的。这些武器有用，不能证明它们就是好的，它们是坏的。

你刚才提到，国际长者会 (The Elders) 主张并呼吁核武器国家达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从 1964 年核试验的第一天开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一直是中国的核政策。所以，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想与长者会的倡议内容是非常接近的，那就是，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受到核武器的攻击。这正是中国一直以来呼吁的。

刚才欧文斯上将提到，我们应该考虑“相互保证毁灭”这个现实，应该努力达成不首先使用网络武器的协议。我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应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这些战略性的、全球性的问题，讨论我们是否应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网络武器，不首先使用太空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

周柳建成：

欧文斯将军，您的军事生涯众所周知，而您也曾任一些电信和科技公司的董事会工作。您如何看待当前华为面临的环境，以及其他大家都知道的技术紧张态势呢？

比尔·欧文斯上将：

我当过 Nortel 的 CEO，Nortel 曾经是《财

“

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办法，让华为手机获得信任，在美国销售。也会找到办法在中国销售获得信任的美国产品，比如谷歌和其他产品。

富》100强企业之一，我们在中国建了很多网络。我和华为的任正非很熟。在我看来，解决方案必须对各方都有利才好。这种说法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但我相信，我们有办法确保我们想要的，也就是电信和网络安全，这些都是中国和美国想要的。你知道，华为已经在英国做了一些澄清工作，来帮助英国政府提高认证其网络的信心。我想，我们都同意存在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法规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了。

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都有间谍机构。但我们必须掌控并了解这些机构在干什么，双方都应该如此。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办法，让华为手机获得信任，在美国销售。也会找到办法在中国销售获得信任的美国产品，比如谷歌和其他产品。若能找到一种适合我们政府要求的方法，那对每个人都更好。

周柳建成：

姚将军，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对话时，允许我请您对这个问题作最后的发言。

姚云竹少将：

我只想说回1971年，那时我还是解放军

的一名年轻士兵。在一个美好的7月早晨，我们听到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的消息。当时是冷战时期，我们作为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是随时准备同美国人和俄国人战斗的。这个消息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辩论这次重要访问的意义。历史已经证明，这次访问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中国，中国向世界开放，世界也向中国开放。中国也帮助改变了世界。一个正在变化的中国仍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这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两个伟大的国家走到了一起。我总是说，我们不能再像敌人一样轻易断绝关系，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过美好时光，我们合作，并肩作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合作了40多年。我不认为任何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可以改变两国间的良好关系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一事实。这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被抹去。刚才你问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回到过去的好时候吗？我认为很难。但与40年前相比，我们已经进步很多。我们无法彻底扭转最近两、三年发生的事情。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要找到途径，找到新方法新框架，来稳定我们的关系，使它可行，使它是竞争性的，同时也有合作性。

比尔·欧文斯上将：

我同意。也许我们应该期待另一位美国总统去中国，或者期待习主席再次来美国。你知道，（访问）并没有议程，去做就是了，也许一切都会改变呢。也许这是过高的希望，但我祈祷我们能像姚将军说的那样，找到出路。

“

但与40年前相比，我们已经进步很多。我们无法彻底扭转最近两、三年发生的事情。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要找到途径，找到新方法新框架，来稳定我们的关系，使它可行，使它是竞争性的，同时也有合作性。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中国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席格尔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两位候选人如何处理对华问题仍然是确保当选的关键。

2020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入最后 60 天倒计时，尽管有新冠疫情掣肘，但竞选强度已明显加大。两位候选人都在忙着宣传他们各自钟爱的政策。当你听这些候选人讲话，或者浏览他们的网站时，你马上会发现，与国际问题相比，国内问题才是他们的议程和中国人民关注的重点。外交政策仍然（不幸地）相对缺失，而它出现时，当日话题往往是中国。

唐纳德·特朗普在四年前曾把抨击中国作为竞选活动的一个核心，这确实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尤其是在中西部各州）。很可能正是这个具有分化作用的问题，让人们把选票投给了他。四年前的胜利优势微弱，而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知道（希望），这种情况会再次出现。

这一次，特朗普可以把他四年来的对华强硬立场当作“积极因素”，来拉拢美国心脏地带、农民和工业基本盘，而不再是利用中国来倒苦水。特朗普在这方面确实是有信用的，他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国最

“

特朗普在这方面确实是有信用的，他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国最强硬、最对着干的总统，他的做法看来与两党对中国的疑虑是合拍的。

强硬、最对着干的总统，他的做法看来与两党对中国的疑虑是合拍的。

特朗普针对中国出台了种种惩罚措施，几乎涵盖所有问题领域。贸易方面，他对中国进口品征收前所未有的关税，并将一些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禁止它们在美国国内或者与美国做生意。办公室设在财政部的跨部门实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已经大大收紧中国投资的许可类别，财政部也正式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美国国务院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行动，如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要求中

国官方媒体和在华盛顿的孔子学院总部注册为“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外交官的行动自由，要求他们在访问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机构前告知国务院。在北京通过严厉的香港国安法后，国务院还撤回了先前给香港的特殊优惠。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一直是内阁部长当中冲在前面的最直言不讳的鹰派，而在今年夏天，其他一些主要官员也协调一致地对中国发出严厉批评。

司法部启动了一项内容广泛的“中国行动计划”，旨在反击中国的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联邦调

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他的部门也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反情报行动，大约每11个小时就会启动一项新案。国防部已经全面加强对抗中国的军事能力，这与国防部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全面、最长远的威胁是一致的。教育部加强了对与中国有往来的美国大学的监督，并与国务院共同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学生某些科目的学习。其他行政部门也采取各自的措施，打击中国的“影响力活动”。此外，美国国会还制定所谓“对中国强硬起来”的立法，给予政府行动广泛的支持。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一连串行动，使他



- ▲ 9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在辩论直播时争吵起来。这是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和克利夫兰诊所举行的第一次总统辩论。

“

可以肯定的是，外交政策不可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占据前排和中心位置的。在这方面特朗普有优势。

在大选中拥有“对华强硬”的可信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8月13日的民意调查，只有26%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积极看法，所以，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许真正成为他的一个竞选优势。可以肯定的是，外交政策不可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占据前排和中心位置的。在这方面特朗普有优势。

在中国问题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面临与特朗普的艰苦斗争。首先，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前几届政府奉行的“接触式”政策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他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期间。这段时期内，拜登与习近平有过大量往来，在奥巴马时期（或之前）的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敦促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为利用这一点，特朗普的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已经在搞“北京拜登”这一媒体攻势。

鉴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过去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他现在要转而批评中国和习近平并非易事，虽然他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称习为“暴徒”。但经过初选阶段早期的几次失误，如他曾说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已经在努力寻找自己在中国问题上对抗特朗普的



10月2日，确诊新冠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前往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治疗。

“比较优势”。拜登尚未发表任何系统或全面的讲话，就中国问题阐明他自己的立场，这对他作为候选人是有很大帮助的。除了批评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和伤害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他没有对中国发表过太多言论。目前不清楚他的竞选团

“

即使立场与特朗普没有太大不同，他也可以出来说，中国已经构成一系列跨党派挑战，需要两党合作来解决。



◀ 10月3日，特朗普总统的主治医生 Dr. Sean Conley 在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向媒体通报总统的病情和治疗情况。

队为什么没有着手这样做。拜登的竞选团队中有许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他可以在许多方面提出对华政策。即使立场与特朗普没有太大不同，他也可以出来说，中国已经构成一系列跨党派挑战，需要两党合作来解决（拜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倡导两党合作）。

如果拜登在哪个领域可以与特朗普对抗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同盟友、伙伴和其他国家联手反击中国在海外的恶性行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中国的行为日益不安，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北京惩罚和操纵的对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十分不幸地将矛头对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而其中

许多国家本可以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成为反击联盟的一员。说到外交政策，重建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促进民主并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这些是拜登的标志性优势之一。还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好拿来开刀呢？

因此，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展开，让我们仔细观察两位候选人如何处理中国问题吧。拜登有自己该做的事，特朗普能否利用好其政府的记录，则还要拭目以待。

“

说到外交政策，重建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促进民主并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这些是拜登的标志性优势之一。还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好拿来开刀呢？

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将犯下历史性错误



赵启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美国正在制造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强硬派对中国的崛起太过敏感，全面遏制中国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在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时刻，两国关系何去何从？这也是世界各国都担忧的大问题。

回想 2000 年也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那年，我在访美前受约瑟夫·W·普理赫大使邀请去美国大使馆会面，并接受美联社等媒体采访。我说中美关系虽有进步，但仍不算好。记者问：“你看，什么时候中美关系就算是变好了？”我回答：“当美国竞选总统，候选人不再用攻击中国获得选票的时候，两国关系就到了新阶段。”我一直深感两国人民之间的陌生和误解是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

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了。我看到了一张政治漫画：共和党和民主党立场一致，把如何遏制“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主题，向中国射出很多飞镖。诸如此类的宣传导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剧增，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

我一直深感两国人民之间的陌生和误解是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

从 2018 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以诚心和诚信与美方进行了多轮谈判，今年 1 月终于取得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的成功，但美方仍旧坚持把中国列为最主要的对手来继续攻击。2017 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和主要对手。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担忧，矛头直指中国。就在今年 5 月，白宫又发布了《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宣称“中国正从经济、

“

凡此种种，表明美国正在制造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凡此种种，表明美国正在制造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出版了《注定一战》，这本书很快有了中译本。中国读者并不认为中美会重复历史上发生过的争霸之战，但美国强硬派却说美国的主要敌人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冷战后美国需要新的敌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要把中美关系逼入“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可以证明中国有悠久的“和为贵”的文化传统。15世纪初，中国明朝政府派出强大的郑和船队远航不是为了开辟殖民地，只是为了宣扬国威和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在今天，还有亚洲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问我，西班牙哥伦布船队规模小得多，却有直接的

经济利益和对土地的追求，中国那么大的花费，但没追求任何土地和财富，中国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与周边国家长期存在的“朝贡秩序”并非殖民制度，而是用以“和为贵”的信仰维持与周边国家长期的和平。我愿意补充一段经常被忽略的史实：明朝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给子孙的一条“训令”就是永远不得对周边15个国家发动争讨战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可是以后又长期陷入冷战的漩涡中。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开始进入较快的发展过程。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至今一再强调不走“国强必霸”的帝国主义道路，中国从来没有挑衅过美国，中国也绝不想参与一场新的冷战。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最典型的案例是对华为的敌视。美国没有任何证据就断定华为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甚至英国人也问“到底谁在怕华为”？“为什么要怕华为”？美国这样极端地扼杀华为是毫无道理和极其蛮横的，是中国公众最看不懂的问题。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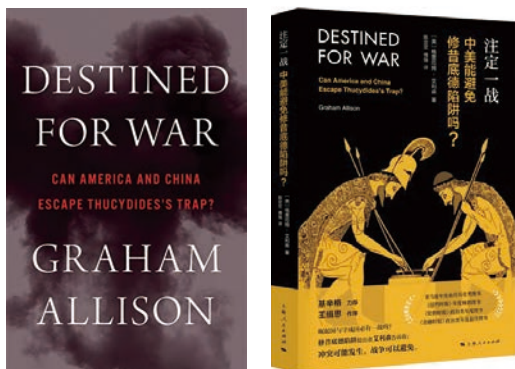
中美两国都需要在此关键时刻努力把握历史发展方向，双方应该有能力也有智慧避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和他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

“

今年新的故事是特斯拉在上海浦东工厂的装配线开动了。人们问，明天还有新的故事吗？似乎任何人也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著作 *Destined for War* (2017) 英文原版和中文版。

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恕我直率地说，美国强硬派对中国的崛起过敏了，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近几年来，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方面矛盾和冲突不断。即便如此，习近平主席仍多次强调，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我曾任上海担任副市长，1990年中国宣布了浦东开发，一时间国际舆论认为这只是口号，而非行动。在90年代，基辛格博士以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点，多次来浦东新区考察。他是第一个说“浦东开发不是口号而是行动”的西方人士，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眼前，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到了需要切实行动的时刻了。

浦东很快由一片农田变成现代新市区。在浦东开发中我们有很多与美国人合作的故事：

浦东新建的三座超高层大楼是中美合作的“产品”，它们的高度是400米、500米和600米，是浦东开发的标志，也是美国设计公司的高水平设计标志。

通用汽车集团和上海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在1997年一年内建成投产，后又在全国建了几个整车生产基地，很快就达到年产400万辆，成为通用在全球效益最高的工厂。2009年通用遇到重大困难，申请了破产保护，上海合资方以最高的诚信和行动，协同理查德·瓦格纳先生一起挽救了通用。

今年新的故事是特斯拉在上海浦东工厂的装配线开动了。人们问，明天还有新的故事吗？似乎任何人也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如何管控中美关系中的敌对成分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都是为中美关系做过历史贡献的人，我们应该有责任帮助两国民众减少误解，增加了解，任何时候良好的民意都是双方政府合作的基础。警惕冲突，减少对抗，我们两国就一定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

恕我直率地说，美国强硬派对中国的崛起过敏了，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 1989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右）作为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使者秘密访问了中国，秘密会见了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沟通的力量



安刚 (An Gang)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坚持沟通的目的是在复杂性和流动性极强的时期尽量澄清一些事实、消除一些误解、避免一些误判、杜绝一些误传，为将来中美关系可能的良性调整预留空间。

中美关系并不缺少危机的“尖峰时刻”，但最终都通过双方基于对共同利益深刻认知的沟通化解掉了。

2020年8月7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去世。消息传到中国，给弥漫在战略界的忧虑和伤感氛围增添了一丝凝重。

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当代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之所以被铭记史册，为中国学界熟知和尊敬，不仅是因为他在实务操作中体现的战略思维，更是因为他曾在最危险时刻参与推动了中美之间的艰难对话。

钱其琛的《外交十记》记录了1989年的接触：“就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喊声甚嚣尘上之时，美国派来了密使。”

“秘使外交”是在老布什总统主动致密函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并得到邓复函之后开启的。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老布什的特使，以在困难中维护中美关系为使命，于1989年7月秘密访华，把邓小平提出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原则带回了华盛顿。

此后半年，老布什三次致函邓小平，邓小平两次复函，就“解铃还需系铃人”原则做更深层次的沟通，商定争取使中美关系重回正常轨道而不是倒退。那一年12月初，斯考克罗夫特再次访华，探寻恢复两国关系的“路线图”。

进入1990年，东欧剧变削弱了老布什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主动性，但随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危机凸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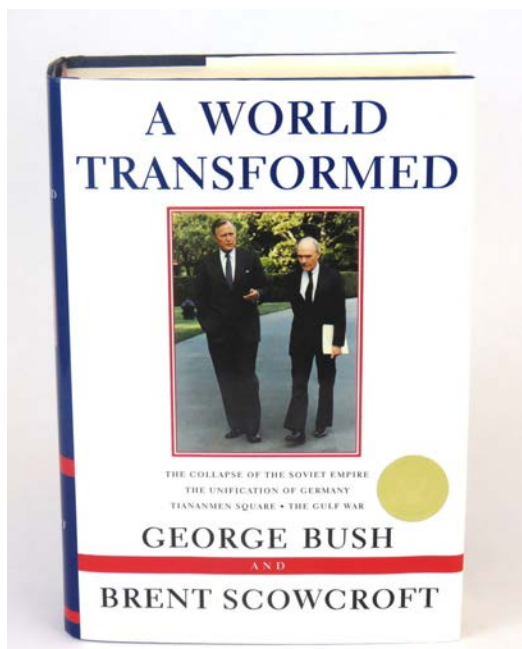
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合作的重要意义，两国外长经多轮会晤，“路线图”步入实施阶段，美国对华制裁开始松动，中国重启融入世界的进程。

这是中美建交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危机解套”。在与老布什合著的回忆录《重组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对那段历史也有详细记述，其中专辟一章并以“解套”为题。

斯考克罗夫特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增进了双方对对方动机的信任度，哪怕在如何行动这一问题上并不一致。他也写道，双方都拥有信念，“路线图”才得以被成功实践，没有这样的信念，即便最严谨设计的对等步骤也难以付诸实施。

当年老布什是带着浓重的中国情结和对中美合作有利于世界的信念推动改善对华关系的，为此他背负了沉重的国内政治压力。在与中方达成一系列谅解后，老布什否决了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佩洛西法案”。这一否决又被众院否决，之后老布什在白宫和国会山之间进行了艰难的协调，才使总统否决在参院再次投票中幸存。难以想像，如果当时总统否决再次被国会推翻，历史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改写。

中美关系并不缺少危机的“尖峰时刻”——31年前、21年前、19年前都曾有过，但最终都通过双方基于对共同利益



▲ 1998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与美国老布什总统合写了回忆录《一起改变的世界》(A World Transformed)，描述了冷战结束时在白宫的感受。斯考克罗夫特在书中回忆当时中美关系面临的危机时说：“我们至少应该留一扇门。”

深刻认知的沟通化解掉了。然而，目前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的危机是弥漫式的，其尖锐度虽尚不及过去几次，但广度和深度却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斯考克罗夫特去世前一天和后一天，特朗普签署两道总统行政令，对中国的TikTok和腾讯公司实施交易限制，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涉港官员实施制裁。中美关系的危机正大踏步向资本市场和网络空间深入，“大脱钩”明显加快。

严格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中美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可以用“大国关系危机”来界定的下坠，管理的必要性和难度远超以往。然而在此过程中，双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失灵现象。

过去几个月，中美之间的官方高层沟通实际停摆，政策信息交换主要靠隔空喊话进行，很多尖锐的言辞和坊间的舆论缺乏当面的解释，在猜测和臆断中不断发酵，加剧了误判的危险。

把控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方向的右翼势力不具备动力、诚意推动沟通，更不具备维系中美关系的信念，指导他们的唯一理念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和高度意识形态化、丛林法则化的政策取向。美国国内政治也失去了给予两国关系一定喘息空间的基本条件，国会成为反华遏华政策的最大“工具箱”，正在进行的大选更为对华强硬政策的极端化操作提供了肥沃土壤。

与此同时，代际更迭将一些少壮派推上美国对华操作的前台，他们热衷于剑走偏锋，缺乏专业的历练和历史知识的积淀，也对战略和政策性对话缺乏耐心，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大于建设性。

显而易见，“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式”的危机沟通无法在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被复制。但对中方而言，随波逐流地放弃沟通努力将是不理智的。中美关系越是向下沉沦，中国就越需要在其运作中重新唤起沟通的力量，一手抗争、一手对话。

“

我们正在经历中美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可以用“大国关系危机”来界定的下坠，管理的必要性和难度远超以往。然而在此过程中，双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失灵现象。



我们需要和谁沟通？

有人说，美国已经决定全力打压中国，沟通是浪费时间。这种说法过于武断。诚然，美国国内已就加强应对中国崛起形成了新的跨党派共识，压制中国对美竞争力的过快增长是今后一二十年的基本方向，但在具体实施策略上美国仍有很大内部分歧，民主党主张同中国有限接触、有限合作。即便在共和党内部，大量专业人员也对白宫的极端做法持保留态度。

且不论中美之间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尚有深度利益纠缠，即便当年美苏相互高度隔绝、各率一个阵营进行冷战对峙，两超之间也是存在庞杂、系统和高度专业化的沟通机制并且坚持运作的。

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危机，我们为何需要坚持沟通？在笔者看来，目的是要在复杂性、流动性极强的时期尽量澄清一些事实、消除一些误解、避免一些误判、杜绝一些误传，并为将来中美关系仍有可能的良性调整预留一点空间，以便在条件重新具备时将其引导回基本稳定和建设性协调的状态。

不得不说，沟通是对美斗争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中方的斗争是为了制约美方破坏两国关系的偏激做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大局，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保持沟通则是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冲突，避免合作彻底破局。

我们需要和谁沟通？在美国，仍有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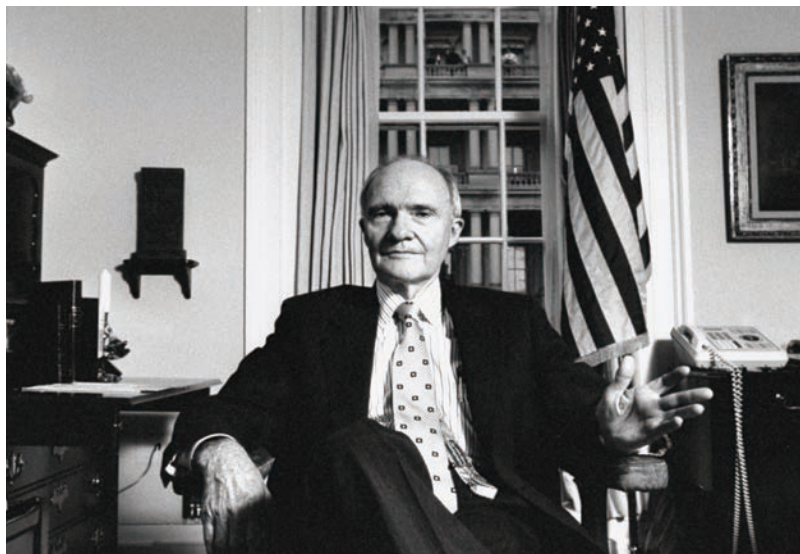
的知识精英和社会民众关心中美关系，认同中美合作对两国和全球的意义，希望它不要继续坏下去。这些人既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也包括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军方内部的专业派、理性派，以及地方州县一级的务实派，更包括美国人民，他们都是沟通的对象。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7月发表的讲话里提出了年内首次访华的意向，随后中美两国防长通了电话，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双方高层之间的沟通意愿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需要沟通什么？第一是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这是国与国之间沟通的永恒首要命题，即便是各说各话，也有助于加深了解、拓展视野、丰富做判断的基础。第二是处理彼此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便是敌国关系，也需要有明确的逻辑边界和行为底线。在这方面，当前十分紧迫的是明确相互尊重政治制度、互不干涉内政、不把意识形态之争上升为中美核心矛盾和两国竞争基本面的基本准则。这似乎是当前中方在对美沟通问题上的首要关切。第三是危机控制和风险管理，这既涉及战略和政治意图，也涉及覆盖面甚广、专业性很强的执行规范和操作规程，以及相关机制建设。这是当前美方在对华沟通问题上的首要关切。在这方面，中方也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学习。第四是即便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也可以保留的合作方向。



我们需要沟通什么？第一是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



▲ 斯考克罗夫特将军（1925年3月-2020年8月）

“

我们应该怎样沟通？这也涉及风格的调整，应多一些坦率，少一些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以便赋予沟通更多实质内涵。

我们应该怎样沟通？这涉及对两国间残存、瘫痪的沟通机制的梳理、激活、改进和完善。事实上，在中美之间，包括防疫和医疗在内，许多领域性、专业级、工作层的沟通交流机制仍在不受政治干扰地默默运转，它们理应得到支持。这也涉及风格的调整，应多一些坦率，少一些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以便赋予沟通更多实质

内涵。此外还涉及渠道的拓宽，应该主动创造条件，鼓励不同界别的人士各显其能，线上线下多走出去，多元沟通，这才符合中美两国都是多元社会的客观条件，才能真正起到“小河有水大河满”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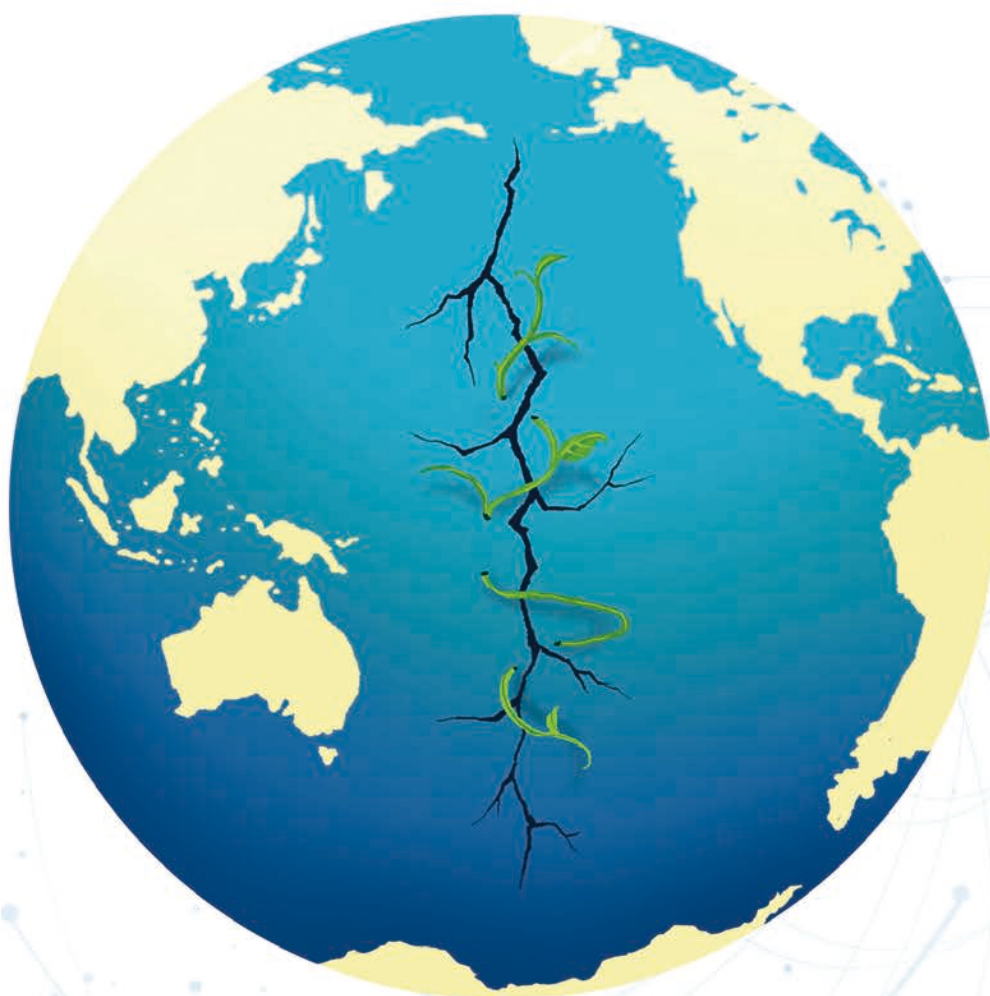
“至少留一扇门”，这是斯考克罗夫特在其回忆录中谈及他面对中美关系危机时写下的话，也是邓小平和老布什在当时极其不利的氛围中的共同期许。邓小平在1989年11月15日给老布什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

富有政治智慧和开放精神的那一代人，以高度务实的态度实现了极难条件下的解套。在他们看来，沟通不是实利主义的工具，而是信念的载体。

“

“至少留一扇门”，这是斯考克罗夫特在其回忆录中谈及他面对中美关系危机时写下的话，也是邓小平和老布什在当时极其不利的氛围中的共同期许。

中美应如何避免爆发新冷战





张沅生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只有坚持对话才能管控潜在的冲突。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即使是有限冲突，也将从此打开中美长期冷战的大门。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未能使中美关系有所缓和，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最近，随着美国大选日益临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连发表反华讲话（包括涉南海问题声明、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以及在参院外委会听证会上的发言等），大有要把中美关系一举推进冷战深渊之势。

中美两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冷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我们决不能忽视中美发生冷战的巨大风险。

在当前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三大风险可能使中美陷入一场新冷战：一

是关系脱钩，二是形成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抗，三是爆发军事冲突。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鹰派势力在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强行推动对华脱钩，企图使中美形成当年美苏经济、社会完全隔绝的状况。但这一做法也会给美国带来严重损害，美国国内也有各种反对声音。中国的对策应该是坚持改革开放，尽力与美方保持各种合作交流，争取在国际法、国际规则基础上逐步形成良性竞争。这将是挫败美国鹰派脱钩图谋的最好途径。

近三年来，中美竞争与摩擦已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但尚未达到对抗的程度。

“

三大风险可能使中美陷入一场新冷战：一是关系脱钩，二是形成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抗，三是爆发军事冲突。

“

与台海不同，在南海，中美双方底线并不清晰，两国军机、军舰频繁相遇，双方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更高。

最近美国鹰派势力极力把中美竞争归结为意识形态之争，欲把中美竞争推向零和对抗。对此，中国决不会上当。不搞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输出，不与美国搞意识形态对抗，争取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应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这对防止中美爆发新冷战将发挥重大作用。

当前，最可能使中美陷入冷战的风险或导火索是中美爆发军事冲突。近两年来，双方在台海、南海的军事博弈和摩擦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如果爆发危机，管控难度将极大，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即使是有限冲突，也将从此打开中美长期冷战的大门。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持续发展，中国政

府不断加强反“台独”斗争和对“台独”势力的军事威慑。然而，中美对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蔡英文政权的看法严重对立，美国国会更出台一系列严重违反“一中”原则的涉台法案，要求政府提升对台关系，加强对台“防卫”。当前，中美在台海的军事活动都明显加强，双方因误判或擦枪走火爆发军事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而更大的风险是，如果“台独”势力和外国干涉势力公然越过中国《反国家分裂法》设定的红线，中国将被迫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非和平手段进行反分裂斗争，在此形势下，中美有可能陷入一场严重军事冲突，甚至是战争。

中国与美国在南海的摩擦主要集中在美方对中国的近岸军事侦察、美军在中国岛礁周边水域持续强化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美国与盟国不断在南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公开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主权争议等问题上。最近蓬佩奥发表的南海声明，更显现了其公然煽动激化中国与南海有关国家间的海上争议、破坏中国与东盟国家磋商建立“南海行为准则”以维护南海稳定的图谋。与台海不同，在南海，中美双方底线并不清晰，两国军机、军舰频繁相遇，双方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更高。

“

当前，最可能使中美陷入冷战的风险或导火索是中美爆发军事冲突。



一旦出现海上突发事件，为防止危机升级与失控，双方应立即开展并保持现场沟通，并应进行高层热线沟通，还可派遣特使进行紧急磋商。

当前，在美国大选前后的高风险期，中美双方如果要避免在台海、南海爆发军事危机和军事冲突，加强危机管理将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第一，中美应尽快重启两军及两国外交部门的沟通渠道，特别是发挥国防部热线的作用，就当前双方的各种军事危机风险进行通报、沟通。最近，美国防长埃斯珀提出希望年内访华，与中方建立必要的危机沟通机制，这是个积极的信号。双方不妨先从线上沟通做起，并可先通过两国的大使馆进行相关磋商。

第二，双方必须把危机防范与规避放在第一位。因疫情停滞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应以线上对话方式率先恢复，双方应重申认真遵守执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及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及其附件，并要求一线官兵的行动与此保持一致。

第三，一旦出现海上突发事件，为防止危机升级与失控，双方应立即开展并保持现场沟通，并应进行高层热线沟通，还可派遣特使进行紧急磋商。此外，在危机中，采取大致对等的军事行动应是双方进行危机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四，在度过美国大选前后的高危期后，双方应继续就加强两国安全危机管理

机制做出重要努力。新的努力可包括两国、两军领导人就进行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充实与建立更多的军事安全信任措施；恢复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和启动中美战略稳定对话（该对话主要涉及中美战略核关系，同时涉及相关外空、网络安全和危机稳定问题），使危机管理成为中美军事安全对话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两国相关战区之间的热线机制；等等。

总之，在中美竞争严重加剧的形势下，必须防止两国因全面脱钩、出现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抗和爆发军事冲突而陷入冷战。相比较而言，当前双方最紧迫的任务是为防止在台海和南海发生军事冲突而加强危机管理。

在美苏冷战中，危机管理曾是美苏两个敌国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开展的唯一“合作”。当前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则有很大不同，它是仍处在竞合关系中但竞争严重加剧的中美两国为防止发生军事冲突与战争、防止两国关系堕入冷战深渊而做出的重大努力。中美两国、两军都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作茧自缚的政策



李成 (Cheng Li)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



麦瑞安 (Ryan McElveen)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副主任



由于中国的所作所为让华盛顿感到担忧，也促使美国政府调整政策，两国精心编织的文化教育交流网正面临破裂危险。但代价将远远大过收益。

7月底，当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的国徽被摘掉、国旗被降下时，一座35年来连接美国和中国西部地区的桥梁断了。此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告别录像，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Jim Mullinax）在视频中向中国人民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我们的关系将会继续下去。”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谭森（Sean Stein）和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也在8月和10月双双离职，他们在告别视频中表达了同样的怀念之情。这三位美国外交官都高度评价他们在三年任期内建立起来的友谊，特别是文化教育交流上的进展。他们对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及始终坚信民间外交的价值表达了深切的谢意。

从期望到恐惧

然而在华盛顿，政治情绪的分歧之大令人吃惊，因为“脱钩论”正在主导着美国有关中国问题的政策对话。持续不断的中美地缘政治争端正好撞上新冠疫情和候选人竞相夸大反华诚意的总统大选。很明显，华盛顿没能如愿实现通过文化外交和“和平演变”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早期目标。当下人们对两国教育交流的普遍看法，是不再把它当作以接触促变革的希望之一，而是一种担忧，担忧美国教育研究机构里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是中共的“武器”。

“

持续不断的中美地缘政治争端正好撞上新冠疫情和候选人竞相夸大反华诚意的总统大选。

北京不仅被指控“武器化”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据说他们窃取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还被指控利用文化交流加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干涉美国的政治。华盛顿的一些政策制定者仿佛才发现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认为这对“自由世界”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

2018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直言不讳地将来自中国的威胁描述为“全社会威胁”，暗示所有中国人对美国来说都是威胁。为应对这些恐惧和担忧，美国司法部采取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关注特定国家（和种族）的举措。这个名为“中国行动”的计划将某些与中国有关的案件指认为“学术间谍”。201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开始调查生物医学界研究人员与中国的关系。他们确定了399名嫌疑人，其中大多数是华裔。雷声称，截止到今

“

对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来说，他们担心的是，除非华盛顿转而采取新的有效手段与北京打交道，否则数十年内，也许更早，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就会在许多重要领域超过美国，并取得巨大的竞争优势。

年7月，联邦调查局跟进的近5000起反间谍案件中有一半与中国有关，而且该局几乎每10个小时就会启动一个牵扯中国的新反间谍案。

对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来说，他们担心的是，除非华盛顿转而采取新的有效手段与北京打交道，否则数十年内，也许更早，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就会在许多重要领域超过美国，并取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再加上美国企业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怨言、新冠疫情中对中国工业和供应链的依赖、人们对技术监控和侵犯隐私的担忧，这些都为全面脱钩提供了额外动力。这些动作使得短期内改善民间关系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暗淡。

从分歧到脱钩

双边关系恶化是两国多年争执、幻灭、失望和不信任的高潮。对于北京过度控制国内政治，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立场，华盛顿是有理由担心的。

毫无疑问，在过去40年里，中国利用了美国经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开放性，特别是在企业和技术创新方面。而中国通过了外国非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极大限制了美国学术机构和其他组织在中国的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当然也可以认为，美国在有意阻挠中国崛起成为大国。

不过华盛顿在教育文化领域与中国脱钩的做法备受争议，影响巨大。据报道，白宫曾在2018年秋考虑全面禁止中国公民的学生签证，但在特里·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强烈反对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终决定不这么做。

今年，特朗普政府出台了加快与中国脱钩的多项重大决定，包括取消和平队计划、发布行政命令终止在中国和香港的富布赖特项目、暂拒1000多名被认为与解放军“军民融合战略”有关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命令中国关闭驻休斯顿领事馆。

美国政府还限制在美国大学主修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的中国研究生人数，并禁止中国学者从事敏感研究。新冠疫情发生前，2018年5月至9月，因为商务、休闲和教育目的获得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就已经比上年减少10万余人，降幅达到13%。

“

尽管中国在2019年仍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学生达37万，但今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大幅下降。

尽管中国在2019年仍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学生达37万，但今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大幅下降。原因有许多，包括美国限制学生签证、中国学生选择其他的海外留学国家，以及新冠疫情。至于美国签证，《财新》6月报道说，只有8名中国大陆学生获得了F-1（学生）签证，另有8人获得J-1（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相比之下，2019年6月发放给中国公民的F-1签证是34001份，J-1签证是5736份。

针对中共党员的旅行禁令提案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它将影响9200万人和超过2亿家庭成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该禁令实际上是不可能执行的，因为无法有效确定中国游客的政治背景。这项提案如果被采纳，将影响大约3亿中国人，并累及多达14亿人。这一禁令引起的强烈反响正在太平洋两岸蔓延。

从软实力到硬现实

随着民间交流内在的柔性力量逐渐



▲ 美国立法者提议立法禁止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科学技术。



如果华盛顿在经济与金融协调、公共卫生合作、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文化教育交流等领域与中国脱离关系，那么美国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影响中国决策者、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意见了。

消失，日益高涨的针对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和麦卡锡主义填补了这一空白。毫无疑问，这种情绪并不会鼓舞在中国的观察人士挑战中共的威权领导，相反，这一趋势疏远了中国人民，促使他们拥护反美民族主义。它还使中国国内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亲美派处境艰难。

虽然应该大力保护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但对中国出生的科学家或华裔美国研究人员搞种族定性，将在三个重要方面损害美国的利益。

首先，保尔森研究所今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研究人员有 60% 在美国，其中美国本土研究人员占 31%，中国出生的研究人员占 27%。美国政府决定限制甚至禁止中国研究生主修 STEM 课程和研究敏感课题，会在不久的将来使留在美国这些领域内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大量减少。正如《纽约时报》撰稿人总结的：“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北京将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

其次，特朗普政府对学术交流的限制，包括取消在中国的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将大大减少美国更好地了解这个复杂国家的机会和途径。在美国必须更多了解中国的时候，决策者却在切断学习的渠道。

第三，若华盛顿的决策者继续寻求全面脱钩，他们就可能失去原本可以对中国广大民众的影响和利用。此外，如果华盛顿在经济与金融协调、公共卫生合作、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文化教育交流等领域与中国脱离关系，那么美国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影响中国决策者、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意见了。

在数十年交往中让中美关系紧密相连的民间纽带已经破裂，这张网几乎就要散了。尽管对中方的担忧促使华盛顿相应调整了对华政策，但中止教育文化交流的成本远远超过它的收益。从根本上说，牺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并不能惩罚中共，相反，这种行为只是自欺欺人，放弃了美国最后残存的影响中国的软实力杠杆。

美台军事同盟是否重生？



特德·盖伦·卡彭特 (Ted Galen Carpenter)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华盛顿正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即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再模糊或犹豫不决。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和台湾正在建立一个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隐性军事同盟。此举表明华盛顿 40 多年来奉行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变，它将加大中美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虽然迈出这一步有显而易见的危险性，但在有影响力的圈子里，支持与台北建立更紧密军事关系的人正迅速增多。

华盛顿与中华民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残余政府，1949 年大陆共产革命后逃到台湾）有过正式的防御条约。这一同盟自 1955 年起生效，直到 1979 年吉米·卡特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与台北断绝正式外交关系并终止了防御条约。

然而，来自国会台湾支持者的压力迫使卡特接受了新的《与台湾关系法》，明确美国与台湾政权之间有所谓的非正式经

“

由于担心激怒北京，华盛顿通常会避免出售具备明显攻击能力的尖端武器或系统。

济和文化关系。《与台湾关系法》还包括两个同台湾安全有关的重要条款：美国承诺向台北出售“防御性”武器；北京对台湾采取任何胁迫行动都将被视为对东亚和平的严重“破坏”。

此后数十年里，台湾似乎成为美国的非正式保护地，但从本质上说，双方关系并不是军事同盟。与被取代的共同防御条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策专家反而主张“战略清晰”，以打消北京以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台湾或试图强迫实现政治统一，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预的念头。

约不同，《与台湾关系法》并未明确规定美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有责任保护它。还有重要的是，该法没有共同防御规划或协同军事演习方面的条款。事实上，历届美国政府不仅禁止安全官员与台湾同行会面，双方政府在非军事问题上的互动也仅限于低层级人员。主要的军事联系是美国定期向台北出售武器，即使在这一领域，美国领导人对于提供什么样的武器系统也持谨慎态度。由于担心激怒北京，华盛顿通常会避免出售具备明显攻击能力的尖端武器或系统。

在特朗普执政的这些年里，所有上述克制表现都大大减少了。我在其他地方写过，国会和行政部门为加大华盛顿对台北的政治与外交支持而采取的那些措施，其中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尽管它们显然惹恼了北京。但是，另外一些举措则是有军事意义的，虽然没有名分，但正快速抵达重新建立防御条约的地步。

其中关键一步是2018年3月通过《台湾旅行法》。该法不仅授权，而且明确鼓励美国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与台湾同行互动，一举推翻了实行40年之

久的政策。次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会见台湾国安委主任李大卫，讨论了美台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军事行动上的合作也日益明显，最早让人注意到这一变化的，就是美国邀请两名台湾军方高官参加2018年5月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会议。

直到特朗普执政前，美国的对台政策始终都是扭扭捏捏的。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把这种做法描述为“战略模糊”之一，按他的说法，这么做是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的领导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不确定美国会做出什么反应。其理论是，这种不确定和模糊会促使双方政府谨慎行事，既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入侵，也防台湾有挑衅性的台独举动。

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策专家反而主张“战略清晰”，以打消北京以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台湾或试图强迫实现政治统一，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预的念头。甚至一些以对中美关系持温和观点而闻名的学者，现在也倾向于放弃战略模糊。

提高战略清晰度的一个关键议案是

“

除了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美国还正在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台湾防卫法》。该议案的支持者、曾在小布什政府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的约瑟夫·博斯科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说，“它将使美国的政策距公开承诺保护台湾只有一步之遥”。确实是这样。如果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将使美国政府有义务“拖延、削弱并最终击败”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企图。

美国最近的行动表明，即使《台湾防卫法》没有通过，华盛顿也正在朝这一方向迅速迈进。8月中旬，特朗普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66架先进的价值80亿美元的F-16v战斗机，以帮助台北提高自身军力。这是多年来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此外，台湾正在建造一个最先进的新维修中心，以便让这些战机保持最佳待命状态。该中心将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台湾汉翔航空工业公司(AIDC)联合运营，美方人员几乎肯定会在哪里工作，为台湾机队提供支持。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强调，维修所需时间“将大大

缩短，实用性将大大提高，确保了空军在前线的作战能力”。

除了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美国还正在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的频次明显增加，甚至成为惯例。华盛顿已经请求台北允许从日本或韩国飞往东南亚的军用飞机使用台湾领空。简言之，除了没有正式声明，特朗普政府在各个方面都把台湾当成了一个独立国家和美国的安全伙伴。

华盛顿正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即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再模糊或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它也许阻止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行为，反而可能激怒它。但是，无论是特朗普总统还是前副总统乔·拜登赢得11月的大选，美国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安全关系的趋势都很可能继续下去。过去三年来，国会和其他地方的各种亲台举措都得到两党的强烈支持，事实上的美台军事同盟正迅速变为现实。

“

华盛顿正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即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再模糊或犹豫不决。

美国正走出对台政策“模糊”



严语

台海问题时事评论员

美国为台湾而战还是弃台而去？随着一系列的华盛顿鹰派声明和国会行动将中美关系推向对抗边缘，这已经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可能的结果一个是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另一个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失去信誉。

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加剧和美国大选的双重刺激下，特朗普政府显著加大对华打“台湾牌”的力度：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称台湾为“国家”；美国指派卫生部长阿扎访台，级别创历史最高；美国准备对台出售仅对核心盟友出售的“海上卫士”大型无人侦察机；美国准备指派主管经济的副国务卿克拉奇甚至商务部长罗斯访台，与台展开首次“经济与商业对话”，并朝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方向迈进……

凡此种种，都推动美台关系升温。美国为何会如此大幅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这背后又折射了美国对台政策怎样的调整？

美国对台政策的清晰化转向

1979年以来，美国对台长期维持模糊政策，既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也从未否认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既不表态会协防台湾，也不声明不会协防台湾。但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不断升级，挺台遏华目前已成为美国共

“

未来无论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美国对台政策都将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和与民主两党的基本共识。共和党自不待言，民主党2020年党纲也删除了“一中政策”，但刻意保留《与台湾关系法》，挺台意味浓厚。可以预测，未来无论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美国对台政策都将由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一是对美台关系定位由“非官方关系”转向“官方关系”。无论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还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只能同台湾维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但特朗普政府明显打破这一承诺，公

“

由对两岸“双重威慑”转向对中国大陆 “单向威慑”。

开与岛内蔡英文当局发展所谓“官方关系”，而且姿态越来越高调，并解密了1982年的“对台六项保证”，其中第五条是“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

二是由对两岸“双重威慑”转向对中国大陆“单向威慑”。美国对海峡两岸长期奉行两面平衡策略，对双方同时施压，既防“陆统”也防“台独”。但近年明显转向，打破了以往对台实质关系特别是军事合作方面“只做不说”的模式，转向“既做又说”，由低调行事转向高调作态，频频对中国大陆单方面极限施压。这将向蔡英文当局释放“美国可信赖”的信号，让蔡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就是支持“台独”，从而鼓动蔡以更大力度加速“台独”布局。

三是对台海局势由维持现状转向破坏现状。美国以往长期反对两岸单方面改变现状，对陈水扁“修宪公投”严令斥责。但美国对蔡英文“柔性台独”、“文化台独”、“修法台独”等采取绥靖怂恿政策，不加约束。

美国还赤膊上阵，通过内阁级官员访台和大规模对台军售等与台湾建立准国家、准外交、准同盟关系，不断改变台海现状。

四是美国的“一中政策”由“一法三公报”转向“多法三公报”。除《与台湾关系法》，美国还相继通过了《与台湾交往法》、《台湾邦交国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等多项涉台法律。目前美国国会正积极酝酿“台湾保证法”、“台湾防卫法”、“防止台湾遭入侵法”、“台湾主权象征法”以及“台湾使节法”等激进法案。美国此举意在构建涉台立法体系，为对台政策建立制度性框架，确保未来无论谁执政都必须遵循法律约束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关系，以此抵消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

清晰化转向的深层动因

美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背后隐藏着多层复杂原因。

短期来看，是为博取选举利益，拉高民意支持。特朗普选情能够止跌回升，由之前的岌岌可危到现在的与拜登呈现胶着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甩锅中国大陆，几乎无时不将矛头指向中国大陆。而利用台湾问题塑造对华强硬姿态，无疑是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优先选项。

中期来看，是要重新抢占台海局势主导权。美国评估大陆的两岸融合策略是加大对台磁吸，日趋加强大陆对两岸关系主动权和

“

目前美国国会正积极酝酿“台湾保证法”、“台湾防卫法”、“防止台湾遭入侵法”、“台湾主权象征法”以及“台湾使节法”等激进法案。美国此举意在构建涉台立法体系，为对台政策建立制度性框架，确保未来无论谁执政都必须遵循法律约束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关系，以此抵消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

“

长期来看，是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军事及战略资源，使得中国大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自身发展，更无足够力量来解决台湾。

主导权。因而美国需要趁中国大陆将强未强、似起未起之际，加大对台海控局力度，以防将来再无介入能力和空间。

长期来看，是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军事及战略资源，使得中国大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自身发展，更无足够力量来解决台湾，以此迟滞整个复兴进程，迟滞两岸统一进程。

清晰化转向的效果评估

台湾问题向来是中美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美国大幅提升与台湾实质关系，不断挑战中国大陆底线，势必加剧台海紧张局势。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军舰在台海地区频频过招，对峙氛围显著增强，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双方若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美国有可能被迫跌入战争泥潭，后续风险不容低估。

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政策清晰化转向，有可能被岛内蔡英文当局绑架和利用。美国不断抛出各种挺台动作，可能直接引发蔡英文当局的误判，误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就是支

持“台独”。有了美国的加持，蔡英文当局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甚至有可能推进“修宪公投”，直接挑动大陆敏感神经，迫使大陆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动用非和平方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届时，是选择为台而战，还是弃台而去，美国将面临两难。若是为台而战，就有可能被迫卷入一场与中国大陆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甚至是“核大战”，而这显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若是弃台而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又将遭受严重考验，将来美国的盟友是否还会继续信任美国，将被打上巨大的问号。

由此可以看出，对台政策清晰化转向，对美国而言整体效果是短多长空。短时间来看，似乎可以利用台湾问题来激怒中国大陆，但若从长时段来看，反而将美国置于两难的境地。未来美国无论是挺台还是弃台，都将承受巨大的风险和考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短暂的清晰化，允许李登辉访美，直接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本世纪初，小布什总统刚上台不久，对台政策再度清晰化，声称“将不遗余力协防台湾”，直接刺激了陈水扁的“台独”嚣张气焰，导致台海危机一触即发。为防止自身利益受损，美国不得不由总统亲自出面，痛斥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以紧急控局收场，防止事端升级。

殷鉴不远。美国对台政策再次呈现清晰化转向，对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后续会带来哪些影响，值得深思。

“

对台政策清晰化转向，对美国而言整体效果是短多长空。未来美国无论是挺台还是弃台，都将承受巨大的风险和考验。

缺席的美国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从长期来看，一个没有美国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但没有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参与的尝试性有限多边主义可能会发展并存在一段时间。

美国7月初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将于明年7月退出世卫组织。近年来，美国已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等，甚至威胁有可能退出世贸组织（WTO）。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以及曾经的全球多边合作旗手，美国的上述反多边主义言行令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美国之所以如此自信，背后的根本逻辑在于它认为没有美国提供领导力，国际合作就无法进行。

笔者认为，国际秩序的重建没有美国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国际社会一方面需要同美国国内的多边主义支持者保持良性互动，为等待新政府回归多边主义展现出战

“

国际秩序的重建没有美国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持续拒绝多边主义的结果只能是自我孤立。

略耐心，另一方面则要有备案，要准备面对一定时期内美国不愿参与多边主义。国际社会需要向美国证明，即使美国暂时缺席全球多边合作，国际秩序仍可运转。这不是反美，而是要最终把美国拉回多边主义轨道，稳定并且升级国际秩序。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持续拒绝多边主义的结果只能是自我孤立。与冷战时代不同，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已经从纵向朝着纵横交错的网络化方向演进。以WTO为例，2017年以来，美国拒绝任命WTO上诉委员会委员，致使该委员会在2019年12月出现委员少于三人而无法运转的情况。今年，WTO总干事在任期届满



美国曾经是互联网全球标准的领导者，而且这种地位是在多边合作中实现的，如果美国企业不能参与新领域标准化讨论，那么美国损失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软实力。

之前又突然辞职。鉴于此，今年4月，欧盟与中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开始对上诉委员会替代方案进行讨论。尽管WTO不完美，但其上诉机制类似于贸易领域的最高法院，如果长期不运转将出现国际贸易司法空白，这肯定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WTO原总干事拉米曾说，即使美国退出，有WTO也比没有要强。这似乎听上去极端，但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紧迫感和焦虑感。尽管这两年，一些双边自贸协定似乎在增加，例如2019年底签署的日美双边贸易协定，但该协定自由化水平较低，很难满足日本这类贸易大国的真正需求。而且日本也担心，如果这样的双边协定过多，将会损害其赖以生存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因此，全球横向联系的拓展和深化结果是，在国际贸易等问题上，各国会更倾向于以国家利益和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为主线，共同探讨多边治理蓝图，而任何国家拒绝参与多边合作都难以持久。

第二，在全球化时代，拒绝多边主义会让本国在新领域标准设定方面失去话语权和制定权。例如，在以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领域中，华为等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相关标准化制定，并扮演着重要角色。2019年5月，美国将华为加入被排斥的实体名单，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公司出口产品给华为违法，也让它们无法同华为进行设定全球行业标准的互动。由于这些新领域的标准制定存在需求刚性，排斥华为这样的核心企业，新标准的讨

论就进行不下去。美国曾经是互联网全球标准的领导者，而且这种地位是在多边合作中实现的，如果美国企业不能参与新领域标准化讨论，那么美国损失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软实力。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国际合作伙伴的多样化意味着不会出现因为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拒绝多边主义就找不到伙伴的情况。例如，今年1-6月，东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第二，美国则成为第三。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地区多边主义深化发展，使本地区各国都有机会更加深度参与全球生产链和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果。与此同时，尽管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企业与合作中国的合作仍然在低调中坚实推进。据媒体报道，英特尔公司旗下的英特尔资本5月宣布对中国的半导体、电子和生物技术等三家企业投资，美国高通公司6月对三家中国通讯公司投资。这说明美国企业很清楚，如果观望等待，其他国家的企业就可能获得先机。

美国是战后全球多边主义的发起者、倡导者和实践者，联合国、WTO和IMF等都是在美国的创造性思维和全局性战略设计中实现的。在未来的国际秩序建设中，美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在实现这个国际社会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美国暂时缺席的多边合作可能会是一个阶段性现象。

中国经济向内大转变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Christopher A. McNally)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在全球性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国内市场。这不仅可以帮助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还能让中国摆脱“世界工厂”称号，成为最精细的全球消费市场。

随着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此前关于“去全球化”和经济“脱钩”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预测——特别是中美之间——似乎正在成为现实。新冠疫情加速并强化了已有态势，削弱了全球一体化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而，将这一过程简单描述为“去全球化”，甚至更深层的“脱钩”，则掩盖了其重要的复杂性。

全球化指的是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过程。在当今时代，它的特征是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全世界人民、政府和公司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加。因此，去全球化代表的是一个单向解体过程，而“脱钩”更进一步，意味着经济（以及潜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联系完全断绝。

“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引入指导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戒律。自那时以来，这种形式的全球主义相当稳定，并令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有了极大发展。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目睹民族国家重新被强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及其他民粹主义运动——无论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割裂国际联系并限制了移民，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尽管如此，全球市场和公司力量的拉动仍给世界带来强大的趋同压力。我们正在目睹的不是“去全球化”本身，而是过去40年中我们所见到的形式独特的全球主义的终结。这种全球主义的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二战后建立的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引入指导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戒律。自那时以来，这种形式的全球主义相当稳定，并令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有了极大发展。但它现在或许已被一个不稳定的过渡时代取代，这个时代显得功能失调，甚至出现危险态势。

新的过渡秩序将以深层次的矛盾为特征。一方面是方兴未艾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以及对技术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的强调；另一方面是自由秩序的残存势力，以及强大的公司力量和全球市场机会。双方势同水火。这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和公司力量碰撞的混乱过渡时期的开始。

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证明这个新时代带来的调整 and 变化。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西方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正

变得越来越以国家为中心。当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再度强调并且发展出了控制经济的新手段，但是，中国的私营部门依然充满活力，而且成为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关键。

因此，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与其说是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治理倾斜，不如说是在建立一种更加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上世纪90年代采取的出口拉动增长战略正不断向由国内消费、本土技术进步和城市化拉动增长转变。

在5月下旬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这种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内市场将起“主导”作用：“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中国正在努力减少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制定更加自力更

“

新的过渡秩序将以深层次的矛盾为特征。这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和公司力量碰撞的混乱过渡时期的开始。



▲ 随着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了严格控制，“十一黄金周”又回来了。从10月1日到8日，为期8天的国庆节和中秋节假期，人们开始出外旅游、休闲、娱乐、消费，高速公路、航空线路和铁路迎来了新冠解封后的“报复性旅游”。

- (左图) 游客在北京后海湖附近购物。
- (右上) 中秋节人们在公园里猜灯谜。
- (右下) 影院重开，“十一黄金周”期间的总票房达到了40亿元。

生的发展道路。在疫情破坏了国际市场和美国奉行“脱钩”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不利环境。尽管如此，这种战略仍有意识地对加强与外部世界互动保持开放。按照习近平的说法，让全球化朝“开放性和包容性”方向发展依然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

上世纪90年代采取的出口拉动增长战略正不断向由国内消费、本土技术进步和城市化拉动增长转变。

采取这种避险战略说明，新的全球态势是一种更加不确定和混乱的秩序，虽然仍存在着市场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素，但摩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事实上，鉴于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冲击，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未来两三年内可能无法恢复。因此，着重于打造国内需求和本土技术的战略就显得意义重大。

尽管出口仍占到中国GDP的30%，但国内消费已经提高到了一个关键水平，成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最关键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与欧盟居民人数大致相当。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的完善工业体系。

中国努力向由国内消费驱动增长转型已经快十年了，现在更是快马加鞭，因为中国

“

与以往侧重于桥梁和高速公路等“粗笨基础设施”不同，这一新数字基础设施规划的目的是鼓励国家的领先企业开发尖端技术，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

领导人担心疫情消退之后全球经济进一步碎片化。政府最近宣布的政策包括一项新的经济刺激计划，重点是发展技术能力。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截至 2025 年的六年内投资约 1.4 万亿美元，实现对美国的技术独立。

这套计划将为各行各业提供支持，包括无线网络，以及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提供支撑的大数据中心。预计，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商汤科技等民营科技巨头都将推动这项新基础设施规划的执行，而美国公司不太可能从中获益。与以往侧重于桥梁和高速公路等“粗笨基础设施”不同，这一新数字基础设施规划的目的是鼓励国家的领先企业开发尖端技术，提高在全球的竞争力。

支持国内消费也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帮助中小企业维持运营的政策目标，其政策措施包括免税、降息和减免社会福利基金缴纳。更短期的措施包括投入 4 万亿元为陷入困境的工厂和商家削减成本。

这些措施有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救助计划。除了已经宣布的额外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券发行，政府还将追加 2 万亿元支出。正如李克强在 2020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最后一天指出的，新的促增长措施重点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新冠疫情和与美国的竞争加剧都在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快速转型。寻求更多经济与技术上的自给自足，这种转变有可能改变全球的经济格局。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寻求更多规避全球

经济冲击的国家。多数大型经济体或经济集团都会更重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不过，有中央政府发挥力量，中国的政策在未来几年内可能更有效、更明显。

事实上，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加快转向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那么，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可能会实质性加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是沿着附加值阶梯向上攀升的，附加值低的活动将被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中国则成为全球关键技术生产和开发的一个中心节点。

而且，与技术日益成熟相伴的，是一个面积与欧洲大陆相仿且不易受到外部干扰的消费市场。至少在近期内，中国经济决策的战略意图是对冲全球持续不断的割裂风险，同时保持它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参与不受影响。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摆脱其“世界工厂”角色，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精细的消费市场。

“

中国并不是唯一寻求更多规避全球经济冲击的国家。多数大型经济体或经济集团都会更重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 当前世界其他地区新冠疫情仍在蔓延，而中国国内已经严格控制住疫情，办公楼、工厂、餐厅、公园、购物中心……甚至豪华车展都已恢复生机。

- (上图) 8 月 25 日，上海单体量最大的购物中心南翔印象城 MEGA 盛大开业。
- (下图) 在浙江湖州的一家工厂，一名工人在生产线上制造钢结构。

给紧张的中美关系降温



何伟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通过高层官员在线对话，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至少暂时获得了生机。
现在双方都需要有所行动，防止出现新的危机。**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在线对话。对话在积极的气氛中结束，中美双方都认可目前的进展，并同意保持协议的正常推进。

一些人认为，在中美紧张关系急剧升级的大背景下，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而此次对话等于在火上洒了些水，令人至少略感释怀。

对话之前，人们对中国购买美国商品和





人们对“第一阶段”协议有两个误解。第一种是认为该协议仅仅是一项简单的单边采购安排，只对中方有约束力。而事实上，它涵盖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检疫、服务市场准入、汇率和贸易扩展等多个方面，中美双方都要承担义务。

服务的进展情况做了各式各样的估计，也猜测协议有可能失败。按照“第一阶段”协议，中国承诺以 2017 年的实际数额为基准，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从美国增加购买 1621 亿美元商品和 379 亿美元服务。商品方面，中国将在 2017 年的 1298 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数据）基础上增购 639 亿美元，使 2020 年的购买总额达到 1937 亿美元。由于去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只有 1066 亿美元，因此 2020 年的实际进口应该增加 871 亿美元。

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 677.1 亿美元，同比减少 24.6 亿美元，降幅为 3.5%，只及全年目标的 35%。而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 4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9 亿美元，降幅为 4.6%，仅及 2020 年目标的 25.6%。所以，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怎么办？

有报道称，中国最近已经加紧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采购。今年 7 月，中国对美国玉米的单日购买量创下历史新高。当月，中国从全球进口的小麦、玉米、高粱和猪肉分别增长 325%、136.5%、147% 和 122%，原油进口量也飙升至 5129 万吨，其中 367 万吨来自美国，同比增幅达到 139.2%。尽管有这些成绩，但完成全年目标似乎是不现实的。



尽管有这些成绩，但完成全年目标似乎是不现实的。

两个误解

人们对“第一阶段”协议有两个误解。第一种是认为该协议仅仅是一项简单的单边采购安排，只对中方有约束力。而事实上，它涵盖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检疫、服务市场准入、汇率和贸易扩展等多个方面，中美双方都要承担义务。

第二个误解是，上述指标被看成是本年度的强制性指标。而事实上，它们只是承诺采购的目标。

“第一阶段”协议中涉及到中方采购的措辞是“承诺”，它包括签订谅解备忘录、采购协议和合同。在签订合同与发货之间通常是有时差的，有些货物可能要两到三年才能发货。由于条件可能发生变化，一些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或许成为不了最后的合同。国际贸易中也有合同履约率一说，它意味着某些合同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履行。

承诺还涉及两个前提条件和两个变数。

第一个前提条件是，根据 WTO 的非歧视原则，中国不能通过削减或不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今年 7 月，虽然美国卖给中国 367 万吨石油，同比增长了 139.2%，但它仍然是排名第五的对华石油供应国，俄罗斯继续以 738 万吨保持首位，是美国的两倍。如果我们把 2020 年的 1937 亿美元目标当成从美国的实际进口，那就意味着实际进口要比 2019 年增加 81.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必须同样增加从全世界的进口。

然而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今年前七个月的全球进口下降 5.7%，从美国的进口下降了 3.5%，

“

根据WTO的非歧视原则，中国不能通过削减或不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

全年增长 81.7% 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购买承诺要建立在价格水平和商业考虑上，因为进口是由公司完成的，而不是政府。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占了进口总额的 23.1%、41.5% 和 33.7%。在购买过程中，公司必须比较不同来源的报价，然后再做出决定。也就是说，美国供应商必须拿出最有竞争力的价格，如果其他供应商更有竞争力，美国就可能得不到中国的采购。购买决策还要看买方的商业考虑，如真实的市场需求和合理的利润。

变数一是自然灾害。“第一阶段”协议规定，如果发生自然灾害，双方可以讨论可能的调整。签字仪式过后不久，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就席卷了全球。

变数二是美国的出口障碍。当中国想购买的产品遇到美国的出口限制，中国可以提出磋商要求。

以上阐述说明，考虑到不同前提条件和变数，第一阶段贸易的增加是不能用中国从美国的实际进口来衡量的，而只能用购买承诺来衡量。为此，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是“第一阶段”协议顺利实施的关键。

“第一阶段”协议在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生态，包括建设性的整体双边关系。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指控和挑战升级，这肯定会损害协议的执行。

对于任何扩大贸易的努力，相向而行都是必不可少的。中方必须尽最大努力让中美双边关系保持正常发展，扩大与美国企业的贸易往来，进一步鼓励按承诺目标从美国采购。此外强烈建议中方在未来几个月采取新措施，扩大更多美国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

目前对美方来说，以下三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美国政府应避免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攻击和限制。如果两国间的总体紧张局势继续下去，特别是如果一场可能的新冷战被提上日程，那么“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无疑将面临巨大困难。

第二，美方应取消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对华技术禁令和出口限制。所有这些措施都妨碍中国根据“第一阶段”协议从美国采购制成品。

第三，美方应支持增加从中国的进口。“第一阶段”协议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中国支持从美国进口更多产品，美国也应该这样做。

美国反复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美国产品，但却禁止进口中国的华为 5G 技术和其他产品。它一再要求中国为美国的服务提供商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但却禁止中国的 TikTok 在美国开展服务。这是不公平的，有可能破坏“第一阶段”协议。对华为技术和产品的禁令应该取消，TikTok 服务应该被保留。只有双方都增加进口，贸易扩展才会成为未来的可持续现实。

“

如果我们把2020年的1937亿美元目标当成从美国的实际进口，那就意味着实际进口要比2019年增加81.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必须同样增加从全世界的进口。

RIVERS OF IRON

数十年来，大卫·兰普顿教授一直在塑造着美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理解。兰普顿在与何莉菁和郭清水合著的新作 *Rivers of Iron* 中延续了这一传统，他在书中审视了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铁路系统及其产生的连通力量。本次专访深入探讨了这些议题。

本次专访录制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由“中美聚焦”特约编辑周柳建成在香港主持。为获得更清晰的阅读体验，以下节选进行了少许文字编辑。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研究荣誉教授

周柳建成：

您在这本书中想要传达的主要讯息是什么？身为作者，您希望读者从书中获得什么希望？

大卫·兰普顿：

我认为这本书的扉页或许能回答你的问题。在扉页上写着本书致敬这样一个命题，即未来属于建立连通而非筑起围墙的人。当然，现在世界各处似乎都能看到我们正在修建隔离彼此而不是连通彼此的围墙。

在我看来，现代化进程其实高度依赖于连通性建设。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访问过的很多中

国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很多东南亚国家也相信，不能坐等致富后才开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你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来致富。所以，如果我们不承担风险，先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永远无法激活现代化所需的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

我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就像我说的“梦幻之地”方法：先建设，其他都会随之而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领导人和东南亚领导人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都认同这个概念。

周柳建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由中国发起的计划，但它也涉及众多其他国家。我想迄今为止应该有超过 90 个国家参与。如果您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民众的一员，您会怎么办？

大卫·兰普顿：

我认为另一种思考方式是，虽然没有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但依然可以认识到“一带一路”无可避免，因此要抓住该倡议创造的机遇。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其实就是开发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南北连通。但在东南亚还有很多国家想要修建从印度到缅甸到泰国，或从柬埔寨到越南的东西连接通路。而日本人在开发这方面的连通上更感兴趣。

当然美国已经加入“蓝点网络”计划，试图建立东西连接通路。但这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如果我们从全局来看，中国修建南北连接通路，西方修建东西连接通路，

二者彼此促进，但并不一定要求后者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因此我认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相信美国已经开始思考它应如何参与进来。

周柳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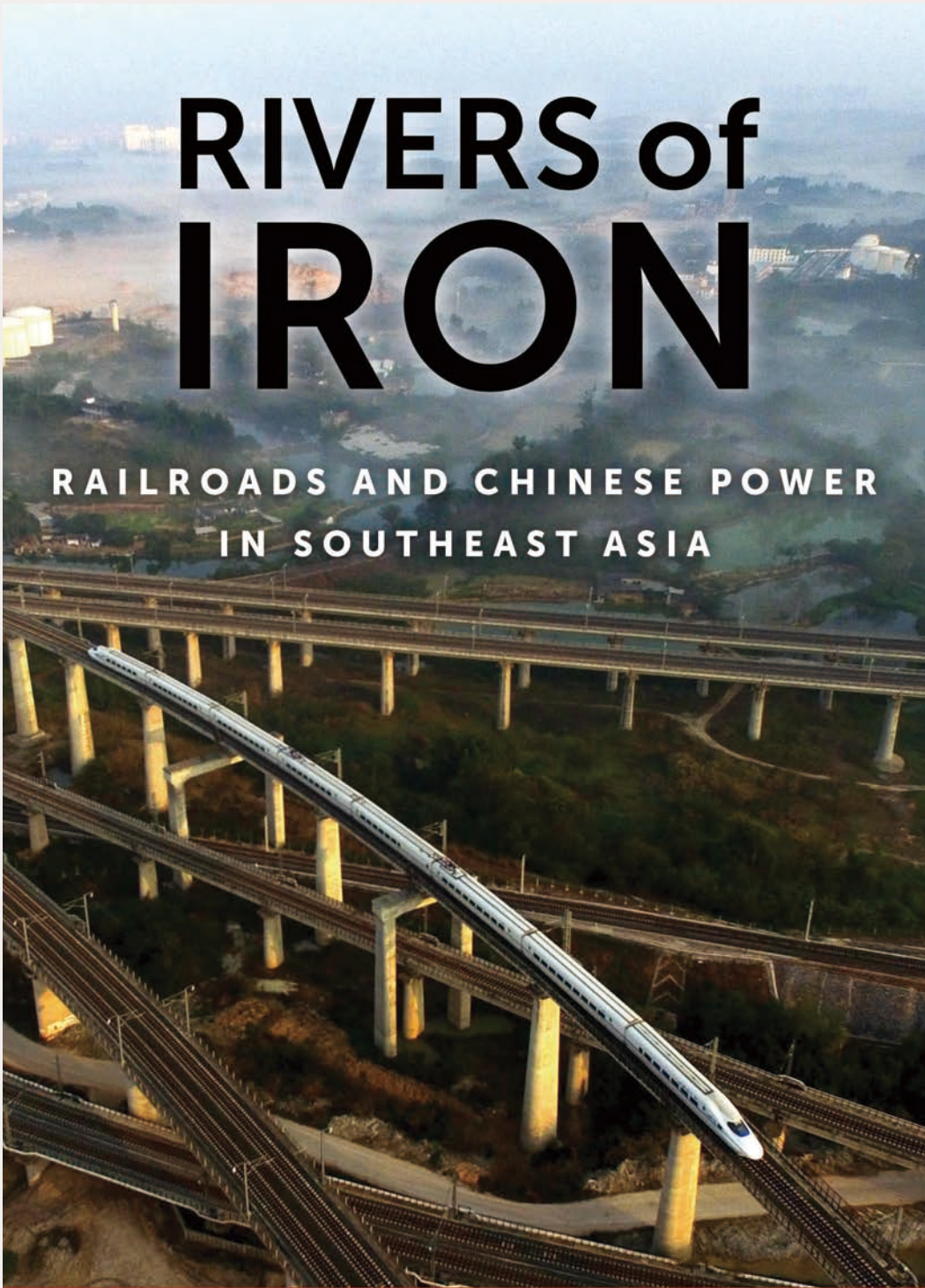
很多年前，您选择将事业和人生奉献给增进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理解。今天的您对年轻时的大卫·兰普顿有何建言？或对您今天立志成为大卫·兰普顿的年轻人有何建言？

大卫·兰普顿：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着更多的挑战，而正是挑战赋予人生意义。因此当我用“挑战”这个词的时候，我并非指消极的意思。

但我这一代人成长于冷战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其实是在美国及其盟友与占当时世界人口 25% 的国家——中国——之间建立交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从理论层面上说也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认为我们不仅在两国政府之间还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我要说的是，当政府彼此意见相左时，年轻人必须找到方法来建立组织，建立帮助并促进两国政府解决问题的对话和探讨渠道。因此我想说，现在对合作、创新和民众积极主动采取行动的需求远比我们那时更为迫切。



RIVERS of IRON

RAILROADS AND CHINESE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DAVID M. LAMPTON, SELINA HO, AND CHENG-CHWEE KUIK

點知天下



Your trusted news sources
from China and HK

World | China | Hong Kong | Business | Videos



Download tap2world now!

<http://tap2world.com>

中美交流基金会简介

中美交流基金会于 2008 年在香港设立，基金会坚信，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两者的积极关系对于世界的福祉至关重要。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实体。

中美聚焦网简介

China-US Focus（中美聚焦，www.chinausfocus.com）由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于 2011 年在香港成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专注中美关系的网络媒体。中美聚焦网站为中美问题的专家、学者、智库和意见领袖搭建了一个交流观点、理性探讨中美关系的平台，成为两国民众和世界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CHINA & US Focus IS PROUD TO INTRODUCE...



A new storytelling experience bringing you up close to the fascinating people shaping our shared global future.

Weekly videos and podcasts hosted by James Chau take you on an exciting journey to 'see' and 'hear' China first-hand.

Now available on all major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chinacurrent](https://www.instagram.com/thechinacurrent)



ABOUT JAMES CHAU

James has earned a special reputation for his interviews with world leaders in politics, science and health. Amongst them,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s Jimmy Carter, Kofi Annan, Muhammad Yunus and Aung Sang Suu Kyi, and also Winnie Mandela, Arianna Huffington and Christine Lagarde. He serves a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oodwill Ambassador and UNAIDS Goodwill Ambassador.

